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总第26辑
2014年秋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 国 研 究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2014 年秋季号 总第 26 辑

主 编 / 张宪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研究. 2014 年. 秋季号: 总第 26 辑 / 张宪文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6630 - 9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研究 - 民
国 IV. ①K25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103 号

民国研究 (2014 年秋季号 总第 26 辑)

主 编 / 张宪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李建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630 - 9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名单

中国内地(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张宪文	张 磊	李文海
李 玉	汪朝光	陈红民	陈谦平
茅家琦	金普森	姜义华	徐思彦
崔之清	章开沅	谢俊美	

港台地区(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玉法 梁元生

国 外(以中文笔画为序)

久保亨[日本]
方德万(Han J. van de Ven)[英国]
罗梅君(M. Leutner)[德国]
柯伟林(W. C. Kirby)[美国]
高念甫(Andrei N. Karneer)[俄国]
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意大利]
裴京汉[韩国]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陈谦平 李 玉(常务) 徐思彦

民国研究

2014 年秋季号 总第 26 辑

目 录

经济与社会

论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	樊卫国 / 1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的再认识	
——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材料的讨论 …	王 眇 缪德刚 / 30
“道义—理性”背后的社会逻辑	
——以 20 世纪初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	张福运 / 45
抗战时期重庆的媒介生态研究	
——以北碚《嘉陵江日报》为例	张 琦 / 57
公园与民国北京市民的“新生活”	
王建伟 / 74	
1927 ~ 1932 年间的陕西旱灾	张 玮 秦 斌 / 88

民国人物

读书人与“革命”的互动：北伐前后周作人对“革命”	
态度的变迁	蔡炯昊 / 103
蔡元培国防经济思想探析	
蔡志新 / 122	
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	
——再论《陈洁如回忆录》	陈 雁 / 131

诗名还是宦名?

——从朱经农看民国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与人生

处境 徐保安 李萌 / 148

民国政治

民初《五旗共和歌》的政治象征解读 赵飞飞 / 167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 ... 李永春 史飞 / 176

易帜后的东北政制转型及其困境

——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中心的探究 佟德元 / 186

专论

宗族制度与国家控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西万载县为个案的考察 ... 杨吉安 / 201

南京国民政府家族制度立法探讨

——以《亲属法》《继承法》为中心 易青 / 212

史料视窗

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1934年5月政治报告 ... 金玉以清译 / 226

学术综述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

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会蓉 黄雪垠 / 235

2013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黄鹏 / 243

稿 约 / 258

Contents

Economy and Society

- On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Shanghai Trade Associ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1912 –1949) *Fan Weiguo* / 1

-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Archival Materials of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 Bank *Wang Fang & Miao Degang* / 30

- The Logic Behind the Debate of Morality and Reason:A Case Study
of Conflict at the Jiawang Min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Zhang Fuyun / 45

- Research on the Media Ecosystem of Wartime Chongqing:A Case
Study of Jialing River Daily in Beibei *Zhang Jin* / 57

- Parks and the Peking Civilians’ “New Life”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Wang Jianwei* / 74

- The 1927 –1932 Drought in Shaanxi Province *Zhang Wei & Qin Bin* / 88

Figures in Republican China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Revolution” : A Focus on Zhou
Zuoren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eriod *Cai Jionghao* / 103

- Cai Yuanpei's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Thought Cai Zhixin / 122
- Person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Memoir of Chen Jieru Chen Yan / 131
- Intellectual or Official?: Zhu Jingnong's Study of Career Selection and the Plight of Intellectuals in Republican China Xu Baowan & Li Meng / 148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Flag Republican Anthem's" Political Symbolism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Zhao Feifei / 167
-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 Mission to Japan in 1920 Li Yongchun & Shi Fei / 176
- A Study of the Northeast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Dilemma: A Focused Inquiry on the Northeast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after the Changing of Flags Tong Deyuan / 186

Monograph

- Clan System and State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Jiangxi's Wanzai County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Yang Ji'an / 201
- Discussion of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Famil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Yi Qing / 212

Historical Materials

- Translation of the May 1934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U.S. Chief Consul at Hankou Jin Yu & Yi Qing / 226

Academic Review

- A Summary Account of Research on Frontier and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 –1949)	<i>Wu Huirong & Huang Xueyin</i> / 235
Review of Mainland China's Research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3	<i>Huang Peng</i> / 243
Call for Papers	/ 258

(目录英文翻译：[美] 何稼书)

论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

樊卫国*

提 要 对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以往论著多以经济群体的角色来认定，关注它在行业治理、市场规范、交易秩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从另一方面而言，同业公会也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集团。民国时期，上海各类同业公会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干预了许多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运用其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以合法路径，阐述政治立场，表达舆论取向，公陈群体诉求，维护和扩展相关权益，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绩效”。作为最有“实力”的民间组织，凭借一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上海同业公会侧身并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为世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准政党”的属性和功能。

关键词 民国上海 同业公会 政治行为 压力集团

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就全国而言，无论是传统工商会所还是新式同业公会，其自主施展的政治行为十分有限。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数同业公会被动应变以图保全，其政治功能并不突出。相比各地情形，沪地工商资产阶级建言立论，抨击时政，不甚“安分”。在近代重大政治变革和政治事件中，上海同业公会^①，尤其是一些大行业的同业公会，或主动参与，或积极策应，或被动卷入，都有一定的“政治表现”。他们以沪地资产阶级中上层之立场表明其态度背向及政治主张。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 民国沪地行业组织多数称同业公会，本文同业公会泛指行业组织，包括一些行业公所及工商会馆。

有关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化功能的论著并不多见，^①相关论著大都以某一时段或某一类别的政治参与为畛域，进行史实论述，均有一定解释力；但立论略显单薄，缺乏将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组织内生性功能的认知，对其政治行为的历史内蕴、行为特点及其政治生态等因素未展开多层次的剖析和阐释，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本文从行为主体的视域，依凭有关档案资料，对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等经济群体的政治行为做若干论析，以期深化研究。

一 民国沪地同业公会的若干政治行为^②

民国年间，上海成为中国行业组织数量众多、形式繁杂、群体行为活跃的城市。^③ 同业公会除了一般的同业市场规范和行业治理等经济功能外，也成为业主议政参政、发表政治主张、开展政治性施为的一个重要平台。

民国沪地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为直接的政治行为，或曰政治活动，如直接参与、介入，甚至发动主导全国性或地方性重大政治事件、政治运动，表示态度背向，公陈政治主张；其二为与政府交往中，一些具有政治属性的言论、行为、举措等；其三为间接的政治行为，主要在于有关国家政府工商、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施行中，同业公会具有政治含义的请愿和诉求等。

（一）直接参与、介入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变革

清末，资产阶级作为新式社会精英，替代士绅步入社会舞台的中心。

^① 专题研究近代上海同业公会政治行为的论著并不多，主要有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近代史学刊》第1辑，2001），研究了民初沪地同业公会的社会化政治活动；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和其专著《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六章“社团政治”，从宏观视角考察了国民党训政制度下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合作及政治表达，其中涉及了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活动。

^② 以修辞学辨析，“行为”与“活动”的意蕴有所不同，“行为”特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政治行为，即社会主体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政治活动一般都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故在特定语境中两者意蕴相似，本文中两者间或可以替代。

^③ 据初步统计，上海工商金融工商会馆、行业公所、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从清末民初的100余个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300余个，几乎各业均有行业组织。另有总商会和市工业会等全市性工商组织，亦有各式马路商会等区域性工商组织。清季至民国末年，沪地各类经济群体展开着广泛的社会化活动，有些组织化活动具有全国性影响。

民国肇建，政治环境为之一变，工商业主社会地位提升，上海行业组织进入了社会化发展阶段，同时演化为民间资产阶级参与介入政治变革和参政议政的组织化工具。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自治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历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中，上海同业公会都不同程度地介入，或深或浅地烙上他们的群体意志，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武装起义，宣布独立。大凡各地起义多为新军举义或官军反正，唯上海起义，主要力量源自沪地商团组织。清末，沪上商界人士鉴于国民躯体羸弱，纷起组织体育会和商团。各业商团又联合成商团公会，士商界之优秀青年踊跃加入，数量达千人以上。在各行业公所的积极组建下，商团成长为上海民间一支准武装力量。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商团公会急函通知各商团准备出防，各商团分头出动”。陈其美率队袭击制造局被执，各业商团集结于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会所。商团“人数虽众”，然“从未一临战阵”，但庭前团员群起鼓噪，大呼“若不发动，我等今日愿洒血阶前，誓不散归”。商团组成敢死队奋勇向前，终攻克顽敌固守之制造局。一亲历者曰，上海起义“能若是顺利者，实由于人心早已倾向革命故也”。^① 上海乃工商社会，将民心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力量，则是由各行业公所组织商团民兵实现的。

上海光复后，许多行业组织纷纷募捐助饷，支持新政府，支援革命军。上海洋药公所专门拟就了代募同业捐助军饷启事，颇能反映当时工商界之政治眼光及其用事态度：“窃自军兴以来，首重饷糈。各兵士摧锋陷阵，奔驰于严寒风雪之中，不惜牺牲其身命，无非为同胞谋幸福。光复以来，各业之乐输军饷者踵趾相接。吾业安居沪上，谁非国民之一份子乎？除函告军政府外，为此布告同业，慷慨乐输，多多益善，少亦无妨。”^② 各业工商组织积极输捐助饷，急公好义，对新生之上海督军政府的巩固起了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据《北华捷报》报道，上海绅商和资产阶级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约700万两的贷款。^③

五四运动由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上海工人阶级全力声援而席卷全国。以往论著多肯定上海工人阶级力挽狂澜的作用，对于上海工商实业界及其同业组织的作用不甚关注。实际上上海各业同业公会积极参与斗争，发表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49、150、151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38页。

^③ 参见《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

宣言号令同业，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等，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有力地推动着运动向纵深发展。五四运动爆发之初，上海各工商团体决议“五九”停业，纪念国耻，声援北京学生。5月9日《申报》报道：“振华堂洋货公所先期通告各同业，今日停市一天。南北市棉业联合会及糖、北货公会、五金九业公所等各大行商，亦皆通告同业，于国耻纪念日停业一天。又，油豆饼杂粮公会、麸皮公会、采菽堂贸易所、麻袋业、棉布等商业界，咸停止交易一天。”次日《申报》继续报道：“其全体一例休业者，首推书业，次则药房、钟表、洋货、棉业等。国人恒称棋盘街为吾国文明发源地，洵非虚誉。该地一带，除各书店一律休业外，即仪器、文具各店莫不休业。”^①

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同业公会的组织下全市各业普遍展开抵制日货活动。他们声称：“敝业亦国民一份子，各具天良，断不致见利忘义，不顾大局。事经公决，绝不食言。”^②沪上各同业组织不仅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且不计利益得失组织同业展开与日经济绝交，其言行态度之激烈，与青年学生比较毫不逊色。各工商团体投入运动，因其经济地位因素，对于政府产生的实质性压力更大。正是由于同业公会的作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得到了一次比较充分的政治动员，成为一支极重要的颇具革命性的力量。

1927年3月蒋介石抵沪，会见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陈光甫等人。虞氏等人组织起上海商界联合会支持蒋介石。该联合会团体成员除了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外，主要为各大行业的同业公会，包括银行业同业公会、钱庄业同业公会、金业同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面粉业同业公会、丝商同业公会、中华船商行会、上海纸业行会、上海航运联合会等。蒋氏表示同意在上海立即恢复和平秩序，并保证劳资关系不久将纳入正轨。^③不久，银、钱两业公会分别借款予新政府，计300万元。^④在这之前，银、钱两业公会婉拒军阀张宗昌的财政援助要求。此一拒一迎鲜明地反映了沪地金融业及实业界的政治态度。此后，1927~1935年间仅钱业就向政府认购债券、借垫及押款共计近3000万元。当然，1928年以后上海

^① 参见《申报》1919年5月8日、9日、10日。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11页。

^③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3页。

^④ 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206页。

商界及工商团体举贷于政府，多属强力压迫下之无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上海银、钱两业公会于9月21日致电国民政府，“今日再不努力图存，国将不国，遑论其他”。为此掬诚呼吁，两业公会提出三点建议：（1）兄弟阋墙，最为不幸，立即息争，以御外辱；（2）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敌忾同仇，以纾国难；（3）通告全国，处以镇静，朝野一心，以挽危局，表示“两公会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用敢电请执政诸公当机立断，集合各地贤杰，聚义一堂，共挽狂澜，在此一举”。^①银、钱两业公会义正词严，态度鲜明地呼吁国内各政治力量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共纾国难，请求政府“集合各地贤杰，聚议一堂，共挽狂澜”。这一全国合力团结抗战的政见，是在西安事变前五年提出的，其政治价值不言而喻。上海金融业两大同业公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不同凡响。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相处，是战是和，中国如何重建，成为国人十分关注的事情。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1946年1月14日，上海绸缎业、米业、制药业、呢绒业、苏浙皖棉纺业、纸业等同业公会100余人举行时局座谈会，联名发表宣言致电政协会议，在宣言上盖章的同业公会达200余家。联名宣言阐述工商界的政治主张：结束纷争局面，奠定和平建国之始基，期望早日举行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和民主法治，还政于民；建立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反对东北特殊化，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土主权完整等。^②沪上工商资产阶级以同业公会联合宣言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时局的主张，不仅在有关税收、物价等方面陈述自己的看法，而且对民主宪政、社会民生、国家主权等方面也给出明确意见。其言其论可谓鲜明果决，充分阐述了民间资产阶级的立场。

（二）二三十年代之交整顿工商团体时的朝野纷争

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以消除旧政府影响、强化国民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为由，对上海总商会和既有同业公会进行接收整顿。这次整合演化为上海同业公会等经济群体与上海党政当局的一次重要制度博弈。

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跟随着工农运动渐起。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对商民运动进行规范引导。该案体现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纲领策略。《决议案》将商人分为不革命和可革命两类，认

^① 《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3-2-5。

^② 参见《本市二百余工商团体发表对时局宣言》，《申报》1946年1月15日。转引自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第332~333页。

为买办商人、洋货商等大商人为不革命者，断定现有之商会为旧式商会，组织不良，被少数人操纵，受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利用，是买办阶级之工具，要发动中小商民组织商民协会取代既有商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改变了有关工农运动的政策，但商民运动策略没有大的变化。在上海市党部的组织策动下，沪上各类商民协会纷起，并成立了市级商民协会，由此否定总商会，也即意味着否定既有之各业同业公会。上海出现了两大商业团体体系——总商会及其各业同业公会与市商民协会及其各级商民协会的严重对立，彼此展开了组织合法性和商界领导权的争夺。1928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第157次会议改变了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要求各地两者分立并存。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上海市党部负责人陈廉伯以统一商民运动为由，向会议提交《解散各地商会提案》，借此打压沪总商会这个能量巨大且难以控制的“体制外组织”。上海市商民协会更是赴京请愿，称上海总商会为反革命组织。4月南京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来沪调查，在沪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接管上海各类市级工商组织，并对全市工商团体进行登记调查。

在此紧要时刻，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卷烟业同业公会、上海针织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纸业公会、云锦公所、上海煤炭公会等数十工商团体联名致函总商会反对整理商会组织，历陈上海总商会资助国民政府，支持北伐的事实，严词驳斥商会不革命的诬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还发表宣言反对撤销商会，宣言历数总商会对于国民政府种种资助之情形，表达了上海金融、工商各主要同业公会对市党部一意孤行废除总商会的强烈愤懑之情。

因商民协会多由中下层商人组成，其涵括之社会经济实力远逊于总商会，在工商界不足以左右和号令资产阶级群体。在既有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呼吁和反对下，国民政府权衡了利弊后，采取了取消商民协会保留商会建制的政策，但对商会进行整理重建。1930年6月21日商整会召开全市同业公会代表大会，宣布市商会成立。7月1日，市商会新选人员宣誓就职，商整会遵章即日撤销。新建的上海市商会与过去之总商会相比，已为国民党党政系统着力控制，听命于党国政府。^① 尽管如此，市商会还是通过合法程序，由全市同业公会代表大会产生，为各业商界认可和拥护。不料，1931年12月18日，奉国民党中央党部命新筹组的上海特别市商人运动委

^① 此时市商会的建制归属，在政治上属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领导，在行政上受上海市政府和市社会局领导，重大事宜由市政府核转中央有关部门备案或批复。

员会突然宣称掌管全市商运事宜，并派大批人员接收市商会。对于商运会接管市商会可能导致的市商会属性及行事制度等的变化，各业公会深为不满，立即做出反应，准备以同业公会联席会议的名义向政府提出抗议，施加压力。不料正在各业代表集会之际，突有市公安局武装警士多人莅场包围，强制干涉，据言，奉市商会指派逮捕开会者，并迫令不得私自集会。各公会代表皆手无寸铁，在胁迫之下，抗争无补，只得暂为屈服，设法迁地举行集会。^①

事件发生后，各业代表“咸感极为愤慨”，各业公会联席会议即发表“为市商会非法压迫事故敬告各界”书。《敬告书》质疑被接管的市商会的合法性，痛斥“此等蛮横践踏民主权利的市商会，绝不能代表商人的利益诉求”，^②由此否决市商运会接管市商会的代表资格。这是一个以各业同业公会名义，沪上资产阶级激烈反抗国民党当局将经济群体任意“政府化”的事件。同业公会联席会议对于“如此不惜摧残我民主精神，剥夺我民权自由”的情形，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此后民间工商组织与商运会势力在报纸上展开了相互攻讦和论战。这一同业公会对抗伪市商会具政治色彩的事件，终由行政院致电上海有关团体不得强行接收（市商会），以免引发骚乱而趋于平息。上海民间资产阶级挫败了一次国民党市党部系统强力接管颠覆上海市商会的企图。

沪地工商界力图维护原来总商会自主性的价值传统和组织秩序，这种维护力量的社会基础来源于或曰根植于广大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

（三）权益诉求中的政治化博弈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颇有希冀，无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均站在进步势力一边。然新统治者初出于收拾人心之需做些惠民让利之举措，久之仍行专制独裁之道，令资产阶级归于失望。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均为自利政府，不仅缺乏民主政权的人民性，并且也不对任何一个阶级、阶层负责。

在上海资产阶级资助下上台的国民政府，对资产阶级索取无度。1927年5月，南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迫使上海商人、银行家等认购月息0.7%的3000万元的短期公债。江苏财政委员会遵令将这些公债以不同数目分配

^① 《上海市各业公会代表联席会议为上海市商会非法压迫事故敬告各界》（1931年12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174-1-27。

^② 《上海市各业公会代表联席会议为上海市商会非法压迫事故敬告各界》（1931年12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174-1-27。

给上海主要商业、银行和工业企业认购。^① 1927年8月上海钱业公会接到总商会要求其再次筹款电函，于26日复电总商会。电文充斥着牢骚：“我同业接续分担，搁此巨款，已决（觉）万分为难……复经敝董再四敦劝到会同业，乃谓商力之困穷如此，军需之紧要如彼，万不获已，亦只能按向来办法，照银行公会允介之数减认一半，但须声明，嗣后无论如何要需，应请避免，俾同业免有颠沛之虞，而于市面金融亦极有关系，自不能不郑重申言之……其归还日期，终以逾早逾妙，俾同业或可稍纾喘息。”^② 钱业公会的不满亦是上海多数工商业组织对国民政府的怨愤。

1928年6月20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及各工商团体联席会议，各业公会代表一百余人在总商会集议，公决组织商业请愿团，进京请愿。《请愿书》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永保安宁、裁减兵额、财政统一、整饬党籍、关税自主、免除杂税、劳资合作、恢复交通等十项请求，并称其中前三项为本，后七项为标。文称“前述十种请求，皆人民还受之痛苦，骨鲠在喉，不得不吐”。^③ 在国民政府甫立之时，上海工商团体代表资产阶级向当局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同业公会与当局的权益博弈主要体现在抨击和抵制不民主的行政举措、不顾民生的经济政策、政府自肥的工商财政法规等。

1930年代初叶，国民政府为了提升国内运输效率，施行铁路航运联运制度，但仅批准国营企业招商局承办，将广大民营航运业拒之门外。“竟专许国营之招商局独家承办，而不准船只吨位超过招商局数倍之全国民营航业一体参加。”水路运输量巨大，招商局运力有限，无法满足需求，民营企业却无缘联运。上海航业同业公会多次吁请，铁道部回文充斥拖延搪塞之辞。上海航业同业公会甚为不满，致电当局，以同业停业向政府施压。1933年11月，上海航业同业公会主委虞洽卿直接致电蒋介石，电文颇激烈：“自政府将招商局收为国有，民众本深疑虑……初不料国营以后，惮于对外，竟先对内，挟政府之权势，压迫民航，不一而足。今变本加厉，竟将全国水路联运独揽专营，不许民营承办，是直为打倒民营矣。夫挟国家权力，打倒民航，何求不得。”^④ 在上海航业同业公会多次上书及蒋

^①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36～40页。

^② 《钱业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174-1-66。

^③ 参见《商业请愿团请愿书》、《钱业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174-1-66。

^④ 《虞洽卿上蒋委员长代电》，《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149-21。